

论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的新特点

杨 子 慧

【提要】 经过21年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结构性特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时认识新特点及其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对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的变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全面分析了这个过程。

【作者】 杨子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审。

7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科学理论界的老前辈、老专家曾经给中国当时的人口特点作过一个科学概括,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人口基数大,年龄结构轻,增长速度快。”这一科学结论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兴起与迅速发展,以及80年代将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都起了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可见一个科学的理论一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便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正好表明,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象应用科学技术那样直接成为生产力,但却可以通过其它中介间接转化为生产力。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口的特点有没有发生变化,哪些内含变了,向何处变动,新特点是什么,又如何表述,它对跨世纪时期的人口控制有何影响?等等,这许多问题都需要作出恰当的解答。笔者不才,明知不胜其任,唯愿就此问题当一问路之石。

一 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特点的新变化

人口特点是有其特定内含的一个俗成概念。所谓人口特点,是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人口群体运动性状及其内在结构的外部抽象。不同的时期,由于人口内在结构及其运动性状的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人口特点。比如中国的人口特点,就曾经有过多次的变化。

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130年中,中国人口在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徘徊后,进入了迅速膨胀的阶段,全国总人口由1亿猛增到4亿多,连续增长了3个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飞跃。这个时期的人口特点可以概括为:高出生,高增长,人口规模迅速膨胀。从1840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苦难的时期,人口内在结构及其运动性状发生了很大变化,高出生率伴随着惊人的高死亡率,人口进入了缓慢增长的低谷时期,109年间只增加了1亿多。即使如此,人口规模还是有所扩大。1850年马克思在论述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时还特别提到:“缓慢地但是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

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革,人口内部运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死亡率迅速为低死亡率所取代,而高出生率不仅没有下降甚或还有升高,于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出生高潮,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飞跃,并由此而影响到人口内在结构的变化。这个时期的人口特点就是众口一词的“人口基数大,年龄结构轻,增长速度快”。

可见人口特点并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对人口特点的认识也应当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根据不同时期人口变动的外在表象,抽象出不同的人口特点。这不仅为人口科学研究所必需,对人口实践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经过了长达20余年的大规模计划生育实践以后,中国人口的运动性状和内在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人口规模继续膨胀

中国人口规模经过历史上的两次大飞跃以后,仍然处于继续扩大的动态之中,而且膨胀的规模仍令人咂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总人口为1 003 913 927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已增至1 133 682 501人^②,8年净增加了129 768 574人,平均每年净增加1 622万多人。另据统计报告资料,198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01 654万人,1993年年末为118 517万人,10年净增加了16 863万人,平均每年净增加1 686万人。不论从何种时点计算,都能表明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中国总人口继续膨胀的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

另外,统观1949~1990年的41年中,人口年净增加量超过1 500万的就有19个年份,而三普至四普的8年中就有6个年份,其中超过1 600万的有5年,5年中又有2年超过1 700万^③。80年代以来,年净增加量对总人口规模膨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展望未来,在数以百计的众多人口预测方案中,没有一个方案显示出近期中国总人口规模有停止膨胀的可能性。所有方案都无例外地表明,到下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总人口达到16亿(有些方案是17亿)以后才能实现“0”增长,人口规模才能随之停止膨胀。

不难看出,跨世纪时期的人口规模一直处于继续膨胀的动态过程中,人口基数还将越来越扩大,直至膨胀到16亿以后才有可能进入相对静止状态。这个特点将一直是中国人口特点中的主“角儿”,并对跨世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二) 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过渡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自然变动及再生产类型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历来为决策者所重视。忽视人口年龄结构而导致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和挽回的。在这方面,中国是有足够教训的。

中国人口自然变动在经历了两次出生高潮和20余年的大规模计划生育实践后,人口年龄结构也已今非昔比。本文以1953、1964、1982和1990年4次人口普查获得的年龄结构资料为例,对照国际通用的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基本指标,大体上就可以看清中国4个不同年份(可以认为是4个年代的代表年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状况,亦便可以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和轮廓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② 均为普查公布的大陆人口。

^③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本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第79页。

国际通用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指标有四项，即0~14岁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老少比（老年人口/少年人口）和人口年龄中位数。根据这4项基本指标分别占有的量化范围，又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3个类型，即年轻型（增加型）、成年型（稳定型）和老年型（减少型）。表1给出国际划分标准与中国4个普查年份年龄结构的比照资料。

表1 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类型标准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类型 (中国四个普查年)	0~14岁人口 占总人口(%)	65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少比 (%)	年龄中位数 (岁)
年轻型	40以上	5以下	15以下	20以下
成年型	30~40	5~10	15~30	20~30
老年型	30以下	10以上	30以上	30以上
1953年*	36.3	4.4	12.2	21.7
1964年*	40.4	3.7	8.7	20.2
1982年*	33.5	4.9	14.6	22.9
1990年*	27.7	5.6	20.1	25.3

* 均按普查100%资料计算。

表1对照结果表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属典型的年轻型；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经过11年的人口自然变动，年龄结构非但没有向成年型方向转化，反而比1953年第一次普查时进一步年轻化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年轻化趋势，使总人口的增长潜能蓄积很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次出生高潮。从70年代初期开始，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实践，人口出生率持续大幅度下降，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变，到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年龄结构已转变为接近成年型，可以认为已进入成年型初期了；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已完成了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的全过程，由成年型初期进入了名实相符的成年型，并且孕育着向老年型迅速转化的成分了。但必须明确，这个时期的成年型年龄结构与完全成熟的成年型晚期不尽相同。由于总人口中仍蕴积着相当强的生育潜能，特别是在总人口规模继续膨胀的前提下，每年的绝对增加量相当可观，这就使年龄结构的一些评估指标如老少比、年龄中位数等，出现了转变迟缓的状态，因而形成了上述差异。然而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过渡的趋势却相当明显。1982~1990年的老化速度为14.3%。按此速度推算，下世纪初总人口年龄结构即可过渡为老年型。目前，有少数地区已达到了老年型标准。这是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特点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热点之一。

（三）增长速度降为较低水平，迎来了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尴尬境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增长率在很长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或高水平。分阶段观察，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1950~1957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21%，最高的1957年达到2.86%；

1958~1961年是一个特殊阶段，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两个年份出现全国性人口负增长，即使如此，这个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有0.46%；

1962~1973年是增长率最高时期,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53%^①。

在长达24年的时间内,年平均增长率从未低于2%,这与前面提到的“增长速度快”是名实相符的。

但是,从70年代初全国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增长速度快”的局面即告结束,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

1974~1978年为迅速下降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为1.52%;

1979~1990年期间,虽然经历了1981~1982年的小高峰和1985年以后一段时间的失控状态,但平均增长率仍戏剧性地持续下降,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43%。

总人口年平均增长1.43%的速度,无论与国内各阶段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还是同国际上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增长率相比,应当说都是较低的水平(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1979~199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比世界1950~1985年、1950~1988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低0.46和0.47个百分点;比亚洲(含中国)、非洲、拉丁美洲1950~1988年的平均增长率低0.77个百分点;仅仅比1950~1988年欧洲、北美、大洋洲发达地区的平均增长率高0.43个百分点。

可以认为,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已远远离开亚、非、拉第三世界人口高增长区,向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发达地区的低增长区靠近,并将继续向发达地区的低水平过渡。

中国人口较低增长水平从总和生育率的动态变化也能看出来。1978~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3,平均为2.518,其中1989年已降为2.253,略高于更替水平(2.1),1993年已降到2.0左右;1991年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为3.4,不发达地区(含中国)为3.9,不发达地区扣除中国为4.4,发达地区为1.9。分区域观察,非洲为6.1,其中最高的东部非洲为6.8;亚洲(含中国)为3.3,扣除中国后为3.9,其中最高的西亚为4.9;北美洲为2.0;拉丁美洲为3.5,中美洲为4.1,南美洲为3.3,加勒比海地区为3.2;欧洲为1.7;前苏联为2.3;大洋洲为2.6。十分明显,中国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世界和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水平,仅仅略高于欧洲和北美洲的平均水平。可以认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发达地区的低水平了,而在发展中地区则为最低水平。特别是城镇人口的总和生育率(1.333),比大多数发达地区和某些发达国家还要低。

但值得重视的是,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较低增长率和较低生育率,可是受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中某些因素的影响,每年人口的绝对增加量仍然相当可观,增长率和增长量之间、生育率和生育量之间显得很失调,形成了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尴尬局面。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的人口特点的的确确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继续延用70年代的那个

表2 中国与世界、地区及国家平均人口
增长率比较

世界、地区及国家	时 间	平均年增长率(%)
中 国	1979~1990	1.43
世 界 人 口	1950~1985	1.89
世 界 人 口	1950~1988	1.90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1950~1988	2.20
欧洲、北美、大洋洲	1950~1988	1.00

① 各阶段平均增长率按指数方程计算。

科学概括来描述今天的人口特点,不仅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难以反映现今人口内在结构及其运动的本质。况且现今的人口特点在跨世纪时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得更加鲜明突出。为此,有必要重新作出一个恰当的概括。笔者以为,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的特点可否作如下表述,即“低增长率高增长量,人口基数继续扩大,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过渡”。

二 跨世纪时期的宏观人口问题

受人口特点的制约,跨世纪时期中国面临的宏观人口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 “低增长率高增长量”将将持续较长时间

低增长率高增长量,本身就是对立的统一。这预示着跨世纪时期新出生的人口数量仍然相当庞大,对总人口规模的继续膨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将是今后中国人口出生数量控制中非常棘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景。

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分性别、分年龄数据表明,“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局面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1990年全国20~29岁生育旺盛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多达11 228万多人,平均每个年龄都在1 100万以上;其中处于生育峰值年龄(23岁和24岁)的育龄妇女有23 382 651人,平均为1 169万。从这个年龄队列的数量和结构不难看出,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不可能有明显的减少,因为最低极限生育量是无法再减少的。

即将进入生育旺盛年龄段和生育峰值年龄的育龄妇女数量也相当可观。1990年普查时,15~19岁的育龄妇女有5 851万,平均每个年龄也有1 170万,10~14岁的准育龄妇女有4 704万多,平均每个年龄有941万,比15~19岁组的数量有所减少。但统观10~19岁的队列育龄妇女数量,总共也有10 555万多,平均每个年龄也有1 056万。就是说,未来的20~29岁生育旺盛年龄妇女只比现在的20~29岁生育旺盛年龄妇女减少673万人,每个年龄只减少67万人。

此外0~9岁的女性人口还有10 310万,到下个世纪的前10年,恰好正值20~29岁生育旺盛年龄段。这批女性人口从现在起按年龄别死亡率递减,到2010年时,估计也有1亿多,每个年龄平均也有1 000万人。

不宁唯是,实际生育行为并不仅仅限于20~29岁的育龄妇女。从1990年普查获取的分年龄生育资料看,有生育行为已婚育龄妇女的年龄分布呈广谱性,从15~50岁的每个年龄的已婚育龄妇女都有一批人生育。其中仅15~19岁的已婚育龄妇女1989年就生育了51.6万婴儿;1989年全国15~50岁已婚育龄妇女生育三孩以上的460万,加上15~19岁中生育一孩和二孩的51.6万,非法早育和多胎生育总共要超过500万;此外还有数百万的计划外二孩。

如此算来,高增长量的局面很难有大的改变。整个跨世纪时期,国家和社会仍需将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应付新出生的人口,仅此一点,也不容将人口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不能只看重低增长率或低生育率而忽视了绝对量,否则很容易为表面的成绩所陶醉,忽略新人口特点所揭示的特殊矛盾,而重蹈历史覆辙。

(二) 老年人口问题将日渐成为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又一个热点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9 697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6%;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6 299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6%。无论按60岁的标准测算,还是按65岁的标准测算,老年型距离我们都是指日可待的现实了。

问题不在于老年型到达的时间是早一些还是晚一些,而在于老年人口的数量规模也在迅

速膨胀。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推算,到200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2~1.3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8~0.9亿;201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6~1.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1~1.1亿;到204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3.8~3.9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将增至3亿左右。不难看出,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膨胀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且数量相当庞大。

如此众多的老年人口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不得不以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应付老年人口的各类问题。

(三)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长快,就业问题仍然棘手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达75 452万,占总人口的66.7%,比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之和还要多。到2000年,预计要增加到9.5亿左右,2010年增加到10~11亿。另据几个预测方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最多时将达到12~12.5亿(2020~2023)。如此庞大的就业大军必然给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就业难的问题将一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农村释放出大批“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涌向社会,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民工潮;接着是城镇改革不断深化,许多企业冗员向社会释放,加上新增加的待业者,城镇“剩余”劳动力也日渐增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就业难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尖锐。就业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引发出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四) 人口出生性别比显著增高

这个问题虽然与新人口特点在表象上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反映了人口内在运动的某些性状与新人口特点在逻辑上的同一性。低增长率的直接原因是低生育率,而生育率越低人们对生育质量的选择越强烈。在这种生育心理的驱动下,人们很自然地将质量选择的砝码偏向于男孩一头。应当承认,在优生优育尚未成为社会普遍行为的情况下,多数人的生育质量观倾向于男孩偏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经济、社会还没有进入发达状态,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完全淡化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只是一厢情愿。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出生婴儿的性别比有逐渐升高的趋势。据四普出生资料,1989年上半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4.3,其中农村为115.1,市为110.4,镇为114.2;1989年下半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3.5,其中农村为114.2,市为110.7,镇为113.8;1990年上半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4.9,其中农村为115.6,市为111.1,镇为114.4。仅此3个半年中相应时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比,1990年上半年比1989年上半年也有所上升,市、镇、农村概莫例外^①,其中农村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最高,其次是镇和市。

1990年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不是孤立的,是有其时间过程的。据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始于1984年。1984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3,其中城镇为105.4,农村为108.5;1985年全国为111.2,其中城镇为104.2,农村为112.7;1986年全国为112.2,其中城镇为107.8,农村为110.5;1987年全国为110.9,其中城市为103.8,农村为112.4,以农村为最高^②。看来导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直接驱动力主要是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过快。

^① 上半年与下半年因出生数量和申报户口等原因,出生婴儿性别比波动较大,故不具有可比性。

^② 《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论文集》,《人口动态》编辑部,1991年,第301页。

出生性别比一般说来是基本稳定的,但也有时出现波动。如果是短时期(一年或二年)内的升高,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假如升高趋势持续的时间过长,甚或未见其减缓之可能性,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国际上对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一向很关注,有些推论包括“人权”观点,终因其主观臆断而失于偏颇,甚或不怀好意,但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事实不能置若罔闻。且不论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真实原因如何,单指这一现象而言,确实应当加以解决。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失衡,不仅将导致人口基本自然结构的改变,而且还会随年龄增长出现许多社会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再不能含糊了。瞒报也罢,漏报也罢,“B超”也罢,溺弃女婴也罢,总归是要了帐的。即以瞒报、漏报论,也该想个法儿堵塞漏洞了。我以为应当单独立法或至少在有关法中设立专条专款,明令禁止瞒报、漏报、“B超”性别鉴定特别是个体B超户经营性性别鉴定等等,违法者严惩不贷。

跨世纪时期宏观人口问题还有一些,如提高人口素质、人口分布、城乡结构等,但主要是以上四点。我以为应当以此四点为龙头,集中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力量,开展多层次的合作研究,探源逐本,研究可操作性解决对策,这对于解决跨世纪时期的宏观人口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三 跨世纪时期人口控制的机遇

新人口特点已经为我们显示出跨世纪时期人口控制难得的机遇。

(一) 低增长率高增长量,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低增长率、高增长量是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后期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在人口规模相当庞大,总人口粗死亡率相对稳定,生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受年龄结构的影响,高增长量几乎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在队列年龄女性人口进入减少阶段时(即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以来逐年出生的女婴陆续成长到婚育年龄时),低增长量才能随之到来。因此,低增长率、高增长量是向成熟的低增长率、低增长量过渡中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犹如分娩前的阵痛。这个阶段尽管降低增长量十分困难,人口出生数量的控制难度极大,但并非没有潜力可挖。从1990年普查生育资料可知,只要严格控制住非法早育和多胎生育,对二孩生育作到按计划安排,全国出生率每年即可再降低4~7个千分点,出生绝对量可减少500~900万人。这对完成人口转变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不仅人口规模继续膨胀的幅度有所减弱,而且人口转变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关键就在于防止出现对人口形势估计的片面性,也要防止出现制止非法早育和多胎生育的畏难情绪,坚韧不拔地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特别是要在“抓好”上下功夫,机会难得,机遇也不是经常出现的,再好的机遇如不抓住,失之交臂,难免成为历史的遗憾。

(二) 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过渡,又是梦寐以求的良好机遇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再生产转变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普遍现象,也是人口转变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尚未具备足以使微观生育行为实现自我控制的先决条件下,超前迎来了向老年型过渡的年龄结构变革,这是20多年计划生育实践立下的又一历史功绩。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老年型到来早一些,老化程度相对高一些,并不会出现如人们忧虑的劳动力短缺,阻碍经济发展等问题。因此,应当对老年型的到来举手加额以兹庆贺。问题是,一段时间内曾经出现了谈老色变,甚至呼吁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主张既要控制人

口,又不使老化到来过快。最近,一些人口控制工作好和已经进入老年型的地区,以为人口控制没有什么好作的了,下一步就是向提高人口素质和调整生育政策转化了,等等。产生这类情绪和认识的原因,一是不了解年龄结构性老化的科学内含,二是把人口年龄的结构性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混为一谈。

我以为,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过渡正是我们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好时机,需要的是再接再厉,而不是斧底抽薪。跨世纪时期正是向老年型过渡的关键时刻,要坚决防止上述情绪的滋长和漫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切不可干那饮鸩止渴的蠢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使抑制生育率积极因素增长,也使刺激生育率因素有所回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对人口控制和生育率转变的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抑制生育率,一是刺激了生育率。

1.抑制生育率的因素增强

(1)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竞争意识的强化,使家庭的生育行为由追求生育数量转向追求生育质量(指健康和智力素质),提高了家庭对孩子的智力投资;

(2)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使人口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促进了人口的迁移流动,推动了城乡物资、文化和信息各方面的交流,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也加快了人口城市化进程,是继续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的出路之一;

(3)改革开放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率先富裕起来,大量兴办了社会保障、各类保险、文化福利设施、改善饮水、住房条件等社会福利事业,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家庭对子女的经济和养老期望值下降,“养儿防老”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4)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通讯网络、交通网络和服务网络的发展,对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刺激了人们对新观念、新生活模式和新生活目标以及小家庭模式的向往与追求,再不愿意扮演传统的家庭角色,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强了,不婚文化现象和不生育文化现象逐渐增加;

(5)经济发展为计划生育系列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提供了物质条件。例如,独生子女保险、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基金会、少生快富合作社、少生快富系统工程、计划生育中心户等等,既是推行计划生育方案的实体,又是经济性服务实体,是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创造。正如罗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Freedman)所说:“好的计划生育方案是一个复合体,……它既能产生生育控制观念,又能提供相应手段和服务。提供的服务越好,观念(指生育控制观念——本文作者注)就越可能被接受和实行”(1979)。

上述因素,都有利于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2.刺激生育率的因素有所回升

(1)家庭中孩子的经济效益增值。改革首先恢复了农村家庭生产经营的功能,其次城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迅速上升,这些都使城乡家庭发展与微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起来,一方面刺激了发家致富的欲望,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家庭对劳动力(生育)特别是男劳动力的需求。

(2)家庭中孩子的养老效益增值。随着人民公社经济实体的解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等一系列福利制度也随之消亡,或名存实亡,城镇退休职工虽然有养老保障,但由于商品市场价格改革,物价上涨指数大大超过了退休金上涨指数,出现了老年退休职工相对贫困化,为此城乡家庭养老功能增强,孩子特别是男孩子的养老效益明显增值。

(下转第7页)

- Migration, Regional Equilibrium, and the Estimation of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1, No.5, pp. 1382-1390.
13. Greenwood, M. J., Gary L. Hunt (1989), Jobs versus Amenities in the Analysis of Metropolitan Migr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14, pp. 1-16.
 14. Harrigan F. J and Peter G. McGregor (1991),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labour Migration*, discussion paper, ISSN 0-86422-149-5.
 15. Hicks (1932), *The Theory of Wages*; Macmillan, New York.
 16. Hunt, H. Gary (1993),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Migration Modelling, *Regional Studies*, Vol. 27, pp. 341-349.
 17. Knapp T.A. and Philp E. Graves (1989), On the Role of Amenities in Models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29, No. 1, pp. 71-87.
 18. Lewis, W. A. (1976),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in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blem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ssays in Honour of H. W. Singer), ed. A. Cairncross and M. Puri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 Muth, R. F. (1971), Migration: Chicken or Egg,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37, No. 3, pp. 295-306.
 20. Olvey, L. D. (1972), Regional Growth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Their Pattern of Interaction,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Vol. 2, No. 2, 139-163.
 21. Schachter, Joseph and Paul G. Althaus (1989),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ross Migr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29, No. 2, pp. 143-159.
 22. Sjaastad, Larry A. (1962), The Cost of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0, pp. 80-93.
 23. 魏后凯:《论我国区际收入的变动格局》,《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第61~65页。
(本文责任编辑:徐莉)

(上接第15页)

(3) 体脑严重倒挂的现实,大大削弱了家庭对孩子进行智力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使本来就低廉的生育成本进一步降低,对应前面提到的孩子的经济效益增值,从而又强化了家庭多生多育的欲望和需求,一本万利的生意哪个不愿意做,这是孩子成本——效益进一步倾斜在生育行为中的反映。

(4) 计划生育管理的外部环境(特殊任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按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形式建立起来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和措施,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很大冲击,计划生育管理机制的改革一直处于紧迫快赶的状态中。市场经济推行以后,计划生育管理外部环境进一步变化,如企业和部分地方的党政领导偏重抓经济建设而放松了对计划生育的领导,计划生育干部队伍人心浮动,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等等。

所有这些,都刺激了家庭的生育需求,或为多生多育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以为抑制生育率的因素是发展的主流。我们应当抓住这一主流,尽可能扬其所长;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弱化刺激生育率因素的影响,尽可能使其朝着抑制生育率的积极方面转化,避其所短,为人口控制开辟新的道路。这也正是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总的说来,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的新特点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含和实践内含。应当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以便更好地为计划生育实践服务。(本文责任编辑:徐莉)